

# 陆机《平复帖》经典化历程与 晚明鉴藏家的趣味和观念

邱才桢

---

本文以陆机《平复帖》的收藏史为主要切入点,探讨陆机《平复帖》在书法鉴藏史中怎样逐步被认为“现存最早的名家墨迹”,即怎样被“经典化”和“权威化”的。研究表明,北宋《宣和书谱》,以及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晚明鉴藏家做出了主要贡献。尤其是董其昌,通过陆机,完成了只有他和陆机才可以代表的“松江书法史”。而这背后,隐含的是从陆机以来,在晚明凸显的经济、文化上的“松江意识”。

---

1956年,《平复帖》由张伯驹夫妇捐出,在经历过被北宋宣和内府和清乾隆内府的两次宫廷收藏之后,它再一次进入故宫博物院,其“博物馆级”和“国宝级”藏品的地位也由此确立。之前漫长的一千多年,它只被少数幸运的皇室成员和收藏家看到;之后,它不断被出版和展览,以原作和印刷品的形式出现在广大普通观众面前,同时出现在多种书法史教材著作中,被冠以“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而且最可靠的古代名家墨书真迹”等多种标签<sup>①</sup>。

然而,关于此帖的讨论并没有停止。尽管张伯驹<sup>②</sup>、王世襄<sup>③</sup>、徐邦达<sup>④</sup>等人对其流传史有详细考证,但收藏史的环节仍有缺漏<sup>⑤</sup>;启功<sup>⑥</sup>、徐邦达<sup>⑦</sup>也对文字内容做过考释工作,但其全文仍不能尽释,帖中所提及的人物也一直悬而未决;尽管对于作品的时代无甚疑义<sup>⑧</sup>,但此帖的著作权是否归于陆机仍然存疑<sup>⑨</sup>。

这些考据还原的困难,当然是由于现存早期文献和作品的不完整与不对应所致。而这种困难至少在明清之前就已存在。我们现在关于《平复帖》的知识,则是基于明清鉴藏家的工作。因此,在对历史面貌的复原难以推进的情况下,本文将另辟蹊径,探讨陆机形象的丰富过程、《平复帖》的流传过程、陆机与《平复帖》的合成过程,更重要的是,通过发掘陆机《平复帖》被收藏、观看、鉴定的过程,即其直至晚明被“经典化”和“权威化”的过程,从而揭示晚明鉴藏家的鉴定标准、方法、趣味,以及之后隐藏的观念。

## 一、西晋到晚明：《平复帖》流传史、鉴藏史以及与“陆机”的合成史

关于陆机的最早记载,是由南朝刘宋文学家刘义庆(403—444)完成的,通过他在《世说新语》中对陆机的记载,我们得以了解陆机的言行<sup>①</sup>、风采<sup>①</sup>、家族以及他对家族和江东地域的荣誉感<sup>②</sup>。而对于他著名的文学理论著作《文赋》,其弟陆云<sup>③</sup>、六朝时期的臧荣绪、刘勰<sup>④</sup>,以及钟嵘<sup>⑤</sup>都有评价。这些记载,以及陆机本人的《文赋》,使陆机的文学家形象得以完成。而陆机较为全面的历史人物形象,则由唐太宗李世民完成,他在《晋书》中,对于陆机的煊赫家世、武将经历、文士才能有详细的记载,尤其全文抄录了其《辩亡论》,并对其文采赞赏有加<sup>⑥</sup>。

上述所有著作均没有谈及陆机与书法的关联,更没有谈及他的书法作品。作为书法家形象的陆机,最早见于南朝梁代庾肩吾的《书品》中。在南朝至宋代之前,以品评体系为主的书法史著作中,陆机的地位一直不高。在庾肩吾的《书品》中,他与王导、庾亮等十八人被列为“中之下”,同时也谈到“陆机以弘才掩迹”,而张芝、锺繇、王羲之三人被列为“上之上”,我们现在熟知的章草书法家索靖、皇象等九人被列为“上之下”<sup>⑦</sup>。到唐代,在李嗣真的《书后品》中,他与庾肩吾等十三人被列为“下上品”,而“上上品”为程邈(隶)、崔瑗(小篆)二人,索靖、皇象等七人则被列为“上中品”<sup>⑧</sup>。在张彦远的《法书要录》“能品一百七人”的“章草十五”人中,没有提及陆机。在韦续的《墨薮》中,“陆机行草”被列为“下上八人”,而“杜伯度章草时称草圣”,同时,“魏韦诞正(书)”、“章草及署(书)”被列入“上中十三人”之中<sup>⑨</sup>。张怀瓘的《书断》中,所列“神品二十五人、章草书八”,以及“妙品九十八人、章草八”中,均没有陆机的名字,也没有提到陆机与章草的关联,更没有提及与《平复帖》的关联。

把陆机和章草、《平复帖》整合到一起,最早是在《宣和书谱》里完成的。《宣和书谱》提到陆机的经历、才华,也谈到“虽能章草,以才长见掩耳”,“书特其余事也”,陆机的位置开始变得相对重要,在为数不多的草书家中,他被列为张芝等少数草书家之后,并在“草书二”中,被列为第一,位置甚至在出生时代比他要早的索靖之前<sup>⑩</sup>,书中还明确记载“今御府所藏二,章草《平复帖》、行书《望想帖》”<sup>⑪</sup>。从此,“陆机《平复帖》”成为紧密结合的概念。《宣和书谱》中的记载,也成为后人鉴定的重要支点。

王世襄等学者谈到,在进入北宋宣和内府和《宣和书谱》之前,《平复帖》曾载入米芾《书史》,为“西晋晋贤十四帖”之一<sup>⑫</sup>,这也是米芾斋号“宝晋斋”之由来<sup>⑬</sup>。检考《书史》,其中只谈及人名,并未提及具体作品<sup>⑭</sup>,故此说也曾遭到徐邦达、曹宝麟质疑<sup>⑮</sup>。《平复帖》如何流出内府,细节已经不得而知,但之后的收藏者和经眼者都很有限,从收藏印和题跋,以及晚些的著录书可知,其曾为元代张斯立、杨肯堂、郭天锡经眼<sup>⑯</sup>,但当时藏于何人之手,已不可知,他们也没有具体的作品描述和鉴定意见传世。此作于明万历年间归韩世能(1528—1598)、韩逢禧(1576—1652后)父子收藏,后由韩逢禧售与张丑(1577—1643),作为著名鉴藏家,张丑在其著作中多次谈到此帖。清初递经葛君常、王济、冯铨、梁清标、安岐等人之手归入乾隆内府,再赐给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理。光绪年间为恭亲王奕訢所有,并由其孙溥伟、溥儒继承,最终由张伯驹购得,并捐出,入藏故宫博物院。

《平复帖》的收藏者和经眼者并不全是言说者,或者是有价值的言说者,换言之,在少数的收藏者和经眼者中,只有极少数人对此帖有过言说,并对“陆机《平复帖》”这个概念的生成和丰富做出了贡献。

北宋之后,陆机和《平复帖》地位的再一次确认是由董其昌完成的,他除了进一步确定陆

机的著作权之外,还确定了该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万历十九年辛卯(1591)董其昌于韩世能处获观真迹,于万历三十二年甲辰(1604)在卷尾写下题跋,认为“盖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并认为在韩氏的收藏品中,“以此为最”,“此帖当属最古也”;同时认为陆机当为“晋初开山第一祖”<sup>27</sup>。张丑曾于韩世能家中获观《平复帖》,并有具体描述,对陆机的著作权并无异议<sup>28</sup>。崇祯元年戊辰(1628)张丑从韩世能之子韩逢禧处购得此帖<sup>29</sup>,并由此取斋号“真晋斋”<sup>30</sup>,但在作者是陆机还是张芝之间徘徊<sup>31</sup>。晚明的鉴藏家中,詹景凤(1532—1602)也曾对《平复帖》的笔法、风格、书体发表过鉴定意见,并认为是真迹<sup>32</sup>。陈继儒(1558—1639)也认为“其书极似索靖笔法”<sup>33</sup>。他们是否目鉴过《平复帖》,已不可知。著名的文人、鉴藏家王世贞的著作中没有提到该帖。

此后的收藏者、经眼者、言说者并无特别贡献。仅就言说者来说,清代的吴其贞《书画记》、安岐《墨缘汇观》有更为详细的著录。但是,我们现在关于“陆机《平复帖》”的主要知识和概念,在晚明即已完成,主要贡献来于《宣和书谱》和董其昌。这是我们探讨“陆机《平复帖》”概念生成的支点。

## 二、晚明鉴藏家之于“陆机《平复帖》”

万历十九年辛卯与三十二年甲辰,董其昌与《平复帖》两次相遇,一次于韩世能处获观,一次于卷尾写下题跋:

右平原真迹,有徽宗标字及宣政小玺。盖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予所题籤在辛卯春,时为庶吉士,韩宗伯方为馆师,故时时得观名迹,品第甲乙,以此为最。惜世无善摹者,予刻《戏鸿堂帖》,不复能收之耳。甲辰嘉平月朔,董其昌题。<sup>34</sup>

董其昌关于陆机及其《平复帖》的另一篇论述,见于《画禅室随笔》:

吾松书自陆机陆云,创于右军之前,以后遂不复继响,当为晋初开山第一祖,诚然,诚然,陆机平复帖作于晋武帝初年,前王右军兰亭燕集叙大约百有余岁,今世张、锺书法都非两贤真迹,则此帖当属最古也。<sup>35</sup>

董其昌给《平复帖》和陆机确立了明确的著作权归属,以及作品在书法史上的时间定位和品质定位。“盖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属于对书作创作的时间定位,这个定位是基于“徽宗标字及宣政小玺”所做出的。“真迹”,属于作品品质定位。而“晋初开山第一祖”是对作者地位的进一步确认,既是客观的书法史的时间定位,也有主观的价值判断。“此帖当属最古也”,既是时间定位,也是风格、趣味、价值观的定位。

在时间上把《平复帖》定位“最古”,主要是基于客观上晚明所能看到的魏晋真迹的减少。如著名收藏家项元汴(1524—1590)和韩世能,其收藏的魏晋书法就颇为有限。以韩世能为例,其藏品中,魏晋楷书,有王羲之三件,王献之一件;行书王羲之五件;“草圣”除《平复帖》以外,有王羲之五件,王献之一件。而至于比陆机更早的张芝、锺繇、索靖、皇象等人的作品,所见就更加有限了。王世贞谈到《急就章》:“自伯英创今草,海内争趣之,章日以废,《书谱》称二王章法俱入神,而其存者,自《孙权》、《豹奴》二、三帖外,不复可见。”<sup>36</sup>董其昌也谈到“今世张、锺书

法都非两贤真迹”<sup>⑤</sup>。张丑也说“元常《宣示》成乌有”<sup>⑥</sup>。即便如此,这些藏品也只有少数书画鉴藏家才能看到。

在《宣和书谱》中,归于陆机名下的除了章草《平复帖》之外,还有行书《望想帖》,后者在北宋之后的流传情况不详,不见于任何文献记载,它在一些著录书中偶被提及,也都是对《宣和书谱》的复制。因此,要判断《平复帖》的作者归属,魏晋同时期章草书家的书作就成为较好的参照。

在魏晋章草书家书作中,晚明鉴藏家经常谈及的是索靖的《出师颂》,它也经常作为陆机《平复帖》的参照物。同样,《出师颂》在此时也是稀罕之物,董其昌就谈到:“锺太傅书,自晋渡江时止传宣示表,百余年间妙迹已绝,宁知今世有索靖《出师颂》耶?”<sup>⑦</sup>王世贞谈到曾入宣和内府的索靖《出师颂》,认为是“唐人临作萧子云颂,因见阁帖内靖数行相类,遂鉴定以为靖出师颂耳”<sup>⑧</sup>。此外,他还谈到于文寿承处所见一卷,上有佑陵泥金御题“征西司马索靖书”,以及其弟敬美(王世懋)购得一卷,被米友仁敷文鉴定以为隋贤书,后入绍兴内府的《出师颂》,都不是真迹:“二迹皆自幼安临出。”<sup>⑨</sup>至于他所得到的索靖另一件著名的章草书《月仪帖》,经他鉴定,“亦是唐人临手也”<sup>⑩</sup>。而张丑也曾谈到索靖的《出师颂》,即是王世贞所谈到的文寿承家藏的那件,“文寿承定为真迹,为之刻石行世”,然而张丑对其是否为真迹表示怀疑<sup>⑪</sup>。此外,他还提及“索靖章草月仪帖一短卷”,对其真伪状况没有发表意见<sup>⑫</sup>。

以上谈到的晚明鉴藏家所见到的“索靖《出师颂》”墨迹,或是唐人临本,或者真伪不详,而索靖《出师颂》和《月仪帖》,以及其他章草书也见于《淳化阁帖》以来的多种刻帖之中,这些刻帖经过反复刊刻,流传甚广,这些也成为晚明鉴藏家认识魏晋章草的重要参照。事实上,晚明的鉴藏家经常以《出师颂》为标尺,来比对、鉴定《平复帖》。

陈继儒就曾经谈到两者之间的“笔法”关联,也收入张丑《清河书画舫》中:“韩存良太史家陆士衡平复帖……云间陈仲醇谓其书极似索靖笔法。吴门韩宗伯存良有陆士衡小柬……其书乃得索靖笔。”<sup>⑬</sup>如果说陈继儒提及《平复帖》“极似索靖笔法”和“乃得索靖笔”还较为谨慎,张丑在谈到《平复帖》时,则直接说“平复帖最奇古,与索幼安《出师颂》齐名”<sup>⑭</sup>,甚至“平复九行,为西晋名贤手迹,且章草奇伟,远胜索幼安、谢安石辈乎”<sup>⑮</sup>。“笔法圆浑”既属于形式构成,也属于风格描述,而“章草奇伟”则完全是风格描述了。通过索靖的《出师颂》与《平复帖》之间的笔法和风格关联,晚明鉴藏家来确立“古”的时间定位,而这里谈到的“古”,显然指的是魏晋,董其昌对此有论述:“吾学书……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锺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sup>⑯</sup>同时,“古”还是风格、趣味和价值标准。张丑在对《平复帖》的叙述中,就多次谈到“古”,或与“古”相关的概念:“士衡平复书淳古”<sup>⑰</sup>、“平复帖最奇古”<sup>⑱</sup>、“篋秘墨皇平复古”<sup>⑲</sup>。

在董其昌的书画评价标准中,“古”是极为重要的概念,甚至是他品评书画的最高标准,他在谈及所推崇的古代书画家时,经常用到“古淡”、“淡古”或“沉古”等词:“书黄庭经后……小字难于宽展而有余,又以萧散古淡为贵,王珣书潇洒古淡,东晋风流宛然在眼”<sup>⑳</sup>;“颜(真卿)书惟蔡明远序尤为沉古”<sup>㉑</sup>;“藏真书余所见有枯笋帖、食鱼帖、天姥噙冬热帖,皆真迹以澹古为宗”<sup>㉒</sup>;“唐林纬干书学颜平原,萧散古淡,无虞褚辈妍媚之习,五代时少师特近之”<sup>㉓</sup>;“独云林古淡天然,米痴后一人而已”<sup>㉔</sup>;“云林工致不敌,而荒率苍古胜矣”<sup>㉕</sup>。自然,董其昌把学习中能否贴近古人作为一个重要标尺:

余于虞褚颜欧皆曾仿佛十一,自学柳诚悬,方悟用笔古淡处。<sup>㉖</sup>

由此,我们可以获知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晚明鉴藏家关于“陆机《平复帖》”的概念生成背后的结构关联,在肯定宋徽宗鉴定成果的基础上,确立其作者和书作的时间定位以及品质定位,而晚明鉴藏家关于魏晋章草的知识背景也隐含其中。通过笔法、风格的比对和鉴定,进一步指向魏晋这个朝代和时代概念,以及“古”这个包容时代、风格、趣味、价值的概念。而这,正是董其昌等晚明书画鉴藏家品评书画的重要标准。

### 三、“松江意识”的凸显

董其昌关于“陆机《平复帖》”概念的生成还隐藏着个人背景,这个背景与董其昌和陆机的共同的地域——“松江”的背景有关,他两次谈到陆机书法时,都谈到其与“吾松书”,即“松江书法”的关联,一次如前所述,一次如下:

吾松书自陆机陆云,创于右军之前,以后遂不复继响,二沈及张南安、陆文裕、莫方伯稍振之,都不甚传世,为吴中文、祝二家所掩耳。文、祝二家一时之标,然欲突过二沈,未能也,以空疏无实际故。余书则并去诸君子,而自快不欲争也,以待知书者品之。此则论云间书派。<sup>⑤</sup>

董其昌强烈的地域意识于此显现。一方面,他确立了松江本地书法家陆机、陆云“晋初开山第一祖”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他在叙述“松江书法史”时,对陆机之后的松江本地书法家表示不满:“二沈及张南安、陆文裕、莫方伯稍振之”,而又“为吴中文、祝二家所掩”。而最终不无矜持而又自得地表示,只有自己“并去诸君子”。在排除了书法史上陆机到自己之间,包括松江和吴中的所有书法家之后,把自己与陆机做了遥远的链接。一方面,他强化了自己与陆机的关联,也强化了松江书法的强势地位;另一方面,他也贬抑了吴中书法家。这样,带有董其昌强烈地域意识,具体地说是“松江意识”的“陆机《平复帖》”的概念得以最终完成。

书法史上的“松江意识”不仅见于董其昌的论述,也见于明代中期和晚明其他松江鉴藏家和文人的论述中,何良俊(1506—1573)就谈到:

吾松在胜国与国初时,善书者辈出。国初诸公尽有善书者,但非法书家耳。其中惟吾松二沈,声誉籍甚,受累朝恩宠……然大沈正书效陈谷阳,而失之于软。沈民望草书学素师,而笔力欠劲,章草宗宋克,而乏古意。此后如吾松张东海……皆以书名家,然非正脉。<sup>⑥</sup>

何良俊对于松江本地、松江书法在元代和明初的声名深为自豪,对于此后的状况表示不快。与此类似的还有与同郡董其昌齐名的陈继儒:

祝允明又论吾乡书法,近朝所称,如黄翰、二钱、张汝弼皆松人也。松人以沈氏遗声,留情豪墨,迄今犹然,然精玉一而已。<sup>⑦</sup>

何良俊和陈继儒,与董其昌一样,都是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他们在对松江书法史的论述中,都表现了强烈的好恶之感。无论好恶,都是个人情感的体现,在这里表现为“松江意识”的强烈

体现。对晚明之前的松江书法的复杂心态是基于对晚明董其昌时代书法的自豪感,这点多见于各种文献。同时,还基于对本地文化的自豪感,如何良俊说:“吾松不但文物之盛可与苏州并称,虽富繁亦不减于苏。”<sup>②</sup>晚明松江人的文化自豪感自然跟松江府的文化兴盛有关。以科举为例,据统计,明代就松江府出了进士561名<sup>③</sup>。而学校的建立和学生的培养,也相当可观,以上海县为例,“除乡贤奉祠生及告老衣中生而外,见列岁历史上的松江科红案者,共约六百五十余名”<sup>④</sup>。如果以一府五学计算,学生有三千余名。“一时家弦户诵,县试童子不下二、三千人,彬彬乎文教称极隆焉”<sup>⑤</sup>。而高官、名宦、作家、书画家、收藏家更是数不胜数,极一时之盛。

当然,晚明松江文化的兴盛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江南地区自从唐宋以来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在明代则更加明显。而松江地方历来是“鱼米之乡”,宋代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盛产稻米等粮食作物的地区。到了明代,松江府的棉纺织业和传统的蚕桑经济天下知名,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松江府已经是一个富裕的江南名郡,粮食充足,航运发达,市镇林立,人口众多,和苏州并称为“苏松”,苏松两府的经济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松江府也成为明代赋税的主要承担者。总而言之,松江府在有明一代,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松江”作为地名出现在元朝,而“华亭”之名始于吴、越时期,“华亭”因之成为“松江”一个代称。东汉及魏晋皆属吴郡。唐末藩镇割据,华亭成为吴越国的一部分。到了晋大福年间,以嘉兴县为秀州,华亭划归秀州属。元十四年(1277),华亭县因为人口增长,升为华亭府,又于其下设立华亭县,次年(1278)改名为松江府,明朝沿袭之,直隶京师,领县三,华亭县、上海县、青浦县。

基于以上的历史沿革,陆机经常出现在各种名称不同的地方志中,作为地方名人被隆重对待,如唐《元和郡县志》,宋《吴郡图经续记》、《吴郡志》,元《至元嘉禾志》以及《明一统志》等。其经历、言行、诗文、旧宅等也一一见于记载,地方荣誉感也于方志中一一展现。

至于陆机本人而言,松江的另外两个地名与他密切相关。其祖父陆逊被封为华亭侯,《明一统志》认为:“汉末孙吴封陆逊为华亭侯,华亭之名始见。”<sup>⑥</sup>而“云间”之名,与他的弟弟陆云有关:“郡名云间,因晋陆云有‘云间陆士龙’之语而名。”<sup>⑦</sup>

陆机本人的家族荣耀感和地域意识也与其祖父和华亭有关,其相关言行多见于《世说新语》中:

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议者疑二陆优劣,谢公以此定之。<sup>⑧</sup>

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sup>⑨</sup>

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sup>⑩</sup>

陆机对其祖父、自己的言行表述中所体现的家族意识,以及“华亭”、“江东”之语中所展示的“松江意识”于此强烈体现。

作为松江人,董其昌显然熟悉这位同乡先辈书法家的掌故。他把陆机《平复帖》定为“最

古”在抨击了其他本地和吴中书法家之后,认为陆机和他才是松江书法史中的两位代表,体现了其强烈的“松江意识”。而这种意识,还存在于其他松江籍鉴藏家之中。

## 结 语

通过探讨可知,陆机与《平复帖》合成的过程,《平复帖》被经典化的过程,以及背后隐藏的晚明鉴藏趣味与区域观念。作为书法家的陆机在北宋之前书法史中的位置并不显赫,在《宣和书谱》中,他与《平复帖》被整合在一起。晚明的鉴藏家董其昌强化了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并将《平复帖》定为“最古”,这正是我们现在关于“陆机《平复帖》”认识的由来。其中,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晚明鉴藏家关于魏晋章草的知识、鉴定方法、趣味、价值观显现其中。更重要的是,董其昌通过与陆机的关联,贬抑本地和吴中书法家的同时,强化了自己在松江书法史上的地位,其强烈的“松江意识”得以体现。而这种意识,普遍存在于松江籍其他书画鉴藏家之中。这些,都基于晚明松江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

- ① 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
- ② 张伯驹:《丛碧书画录》,张伯驹《春游纪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 ③ 王世襄:《西晋陆机〈平复帖〉考略》,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期。
- ④⑦ 参见徐邦达《陆机平复帖》,《徐邦达集》一,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
- ⑤ 徐邦达认为“不能肯定此帖必然就是李玮家藏本”,那么米芾《书史》中所记载的陆机帖不一定是《平复帖》,该说与王世襄不同(参见徐邦达《陆机平复帖》)。
- ⑥ 参见启功《平复帖说并释文》,《启功丛稿》,中华书局1999年版。
- ⑧ “证以西陲汉简,是由隶变草之初,故文不尽识……为世传,无疑晋迹”(参见张伯驹《丛碧书画录》)。“此帖结构同于草书,但无挑笔波势,与所见《淳化阁帖》第二册中所刻西晋初卫瓘《顿首州民帖》大略相似,应即草书,笔法很朴拙,秃毫中锋直下,较少顿挫。近世纪在新疆一带所发现的汉晋木简纸片古墨迹中,有些草书,和此帖的写法很接近,虽地分南北,仍可见一时风格。麻纸……其质料制法种种和汉魏时代的東西没有什么两样,这就加强了它确是晋人墨迹的可信性”(参见徐邦达《陆机平复帖》)。“字体结构及纸张形制诸方面,都是认定晋物足以倚信的根据”(参见曹宝麟《陆机〈平复帖〉商榷》,载《书法研究》1985年第1期)。
- ⑨ 启功考证帖中的“彦先”即“贺循”,因而认为是陆机真迹(参见启功《平复帖说并释文》)。徐邦达否认“彦先”即“贺循”,应另有其人,但应该为陆机书(参见徐邦达《陆机平复帖》)。曹宝麟认为“彦先”是“贺循”,“寇乱”即“永嘉之乱”,但与陆机的生平不合,认为非陆机之作。同时认为此帖作于西晋怀愍未叶至元帝中兴之初这段时间(参见曹宝麟《陆机〈平复帖〉商榷》)。
- ⑩ “土龙为人文弱可爱,土衡长七尺余,声作钟声,言多慷慨”(徐震堦:《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3页)。
- ⑪ “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讪,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徐震堦:《世说新语校笺》,第479页)。
- ⑫ 参见徐震堦《世说新语校笺》。详见后面论述。
- ⑬ 陆云指出了陆机《文赋》语言华丽、文风繁缛的特点(参见陆云《与兄平原书》,《陆云集》,中华书局1988年版)。
- ⑭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共有二十三篇涉及对陆机其人其文的评价,他将陆机的创作概括为“情繁辞隐,思巧文繁”(参见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 ⑮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陆机文赋,通而无贬”,认为《文赋》只谈论了文体,而没有对具体作家的优劣作出评价(参见《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 ⑯ 《晋书》,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81页。
- ⑰ 庾肩吾:《书品》,《中国书画全书》第1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 ⑱ 李嗣真:《书后品》,《中国书画全书》第1册,第54页。
- ⑲ 韦续:《墨薮》,《中国书画全书》第1册,第14页。

- ⑳㉑ 《宣和书谱》,《中国书画全书》第2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版,第37、40页,第40页。
- ㉒㉓㉔ 米芾《书史》,《中国书画全书》第1册,第963页,第963页,第963页。
- ㉕ 参见徐邦达《陆机平复帖》,曹宝麟《陆机〈平复帖〉商榷》。
- ㉖ 吴其贞《书画记》记载“至元己酉三月己亥,济南张斯立、东郭杨肯堂同观,又,云间郭天锡拜观”(《书画记》卷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 ㉗㉘㉙㉚㉛㉜㉝㉞ 张丑《清河书画舫》,《中国书画全书》第4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第137页,第379页,第137页,第137页,第144页,第144页,第144页,第144页,第144页。
- ㉟ “丑近购陆机《平复帖》,王羲之《此事帖》……”(张丑《清河书画舫》,《中国书画全书》第4册,第125页)。
- ㊱ “乃因《平复帖》颜其斋曰真晋,诚重之也,诚慎之也”(张丑《真晋斋记》,《真迹目录》卷四,《中国书画全书》第4册,第420页)。
- ㊲ “平复从来属伯英(伯英书平复帖见宣和书谱),陆机题品岂真评,蔡伦网纸留残墨,章草天成大主盟”(张丑《清河书画舫》,《中国书画全书》第4册,第379页)。
- ㊳ “陆士衡平复帖,以秃笔作稿草,笔精而法古雅,真迹也”(詹景凤《东图玄览编》,《中国书画全书》第4册,第13页)。
- ㊴ “云间陈仲醇谓其书极似索靖笔法,始知阁帖所刻陆云书亦后人之为,陆更古也”(张丑《清河书画舫》,《中国书画全书》第4册,第144页)。
- ㊵ 参见《平复帖》跋尾,故宫博物院编《晋陆机平复帖》,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 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第70页,第88页,第29页,第78页,第58页,第54页,第62页,第133页,第110页,第46页,第48页。
- ㊿㊱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台北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6181页,第7025页。
- ㊱㊲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续稿》卷一六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㊳ “索靖章草《出师颂》一卷,用黄麻纸书,之上有宣和印识,而朱色如新,且与书谱文合,故文寿承定为真迹,为之刻石行世……其真是耶?否耶?”(张丑《清河书画舫》,《中国书画全书》第4册,第138页)。
- ㊴ 何良俊《四友斋书论》,《中国书画全书》第3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版,第866页。
- ㊵ 陈继儒《妮古录》,《历代笔记书论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8页。
- ㊶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6页。
- ㊷ 邱明正主编《上海文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 ㊸㊹ 叶梦珠《阅世编·学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第26页。
- ㊺㊻ 李贤《大明一统志》第二册,台联国风出版社1977年版,第709页,第710页。
- ㊼㊽㊾㊿ 徐震堉《世说新语校笺》,第167—168页,第479页,第48页。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 陈诗红